

文化中国行

27° 人文

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

6月9日,贵州省图书馆北馆6楼展厅,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——史继忠学术文献展”开展。

今年89岁的史学专家史继忠大半生中的各种专著、合著、修志编史、学术论文、奖状证书等珍贵文献,在此展出。临展为期一个月,常设展区则永久落户黔人书苑。

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这句取自王维诗句的展览主题,是史继忠自己选定的。展厅内悬挂的一幅出自书画家刘奇卡的书法作品,书写的正是这两句诗。史继忠说,当年住在南明河畔,多少个夜深人静之时,听着窗外河水哗哗流淌,一个人在灯下伏案写作。无意间的一篇文章发表后,被国家级媒体全文转载。那一刻的感觉,就像独自在幽深的林子里走了很久,忽然间有一束月光,从林叶的缝隙中静静地照了进来。

本次展览,史继忠将毕生著述全部捐出,让它们从私人的书房走向公共的图书馆——也是欲化身为明月,去照亮更多的人。



史继忠文献展示。贵州省图书馆供图

深林
月
人
来
不
相
知
照



展览海报。贵州省图书馆供图

困厄中默诵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

展览的角落里,有一张史继忠年轻时的照片。黑白影像里,一个清瘦的青年站在四川大学校门前,目光清澄而坚定。那一年,他刚踏入历史学的殿堂,不知道命运会给他设下多少道关卡。

1937年,史继忠出生于贵阳。1962年,正当他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埋头苦读,准备“史海撷珠”时,一场变故,让他被迫离开学校,连毕业文凭都没有拿到,便被下放到开阳县顶兆公社。

那一年,他25岁。

命运从不厌倦“欲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那些套路。1963年,史继忠应征入伍,成为一名铁道兵,在乌蒙山区修铁路。长年累月扎在山沟里,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石头、凿隧道。在这人生的最低谷,他养成了一个习惯——默默地背诵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:“肠一日而九回,居则忽忽若有所亡,出则不知其往。每念斯耻,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。”书中那些关于隐忍与坚守的文字,像一根看不见的绳索,把他从深渊里一点一点拽了上来。

转业后,他进了贵阳骨胶厂。从开山挖土到浇筑水泥,从安装机器到钻研化工技术,他硬是把自己从一个历史系学生变成了化工专家。他很快掌握了生产普通骨胶和电影用明胶片的技术,炼出了骨胶,还同几个知识分子大搞骨头综合利用,从骨粉里提取磷酸氢钙、磷酸二钠和硬脂酸。史继忠还为厂里搞了一个科研项目——《杂骨综合利用方案》,获得国家燃料化学工业部批准,拨给了15万元经费,生产出多种产品。

1978年7月,他在《贵州日报》上看到一条不足百字的消息: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,年龄放宽到40岁。那一刻,他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。他40岁通过考试,成为云南大学历史系方国瑜教授的研究室,就此走上专业的历史研究之路。

为贵州新方志编纂拓荒

1983年,史继忠与省内史学研究者联合出版了《明实录·贵州资料辑要》。这部书,第一次把明代200多年间有关贵州的史料系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这部《辑要》溯源贵州历史,许多过去模糊的史实和情况得以廓清。混沌茫蒙的贵州历史,终于开始轮廓清晰、条理有序。

这部书,只是他“史海淘金”的开端。

此后数十年,他以贵州地方史为经,以社会调查为纬,逐一研究民族史、文化史、经济史,对贵州各方面历史展开了全方位的探索。他独著的《贵州文化解读》《中国地域文化大系·贵州文化》《西南民族社会形态与经济文化类型》等十几种书,共计350万字;发表的150多篇学术论文,逾百万字。与人合著的《贵州六百年经济史》《贵州省志·地理志》《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》《贵州通史》等,更是在600万字以上。

这些宏大、翔实的史学专著,是贵州历史的系统总结,也是贵州史学方面的基础工程和系统工程。其中,《贵州六百年经济史》和《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》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一等奖,《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》获二等奖。

史继忠治史,从不困在书斋里。

为了写《贵州瑶族》,他深入瑶族地区数月,获取第一手资料。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,都经过大量调查研究,并对史实反复核对。

他主持编纂的《贵州通史》,也是这一理念的实践——抛弃了以往堆砌资料的弊端,以令人信服的考古成就道出远古贵州曾是人类文明的孕育地之一;以详尽的历史文献描绘贵州并不偏居一隅;以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贵州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并非总是落后。这部书,被誉为“为贵州历史正名之作”。

与地方志的缘分,则几乎贯穿了史继忠整个学术生涯。从《贵州省志》到《贵阳市志·建置志》《贵州省志·地理志》,他担任过各类地方志的编纂负责人。《贵州省减贫志》等新方志的编纂,更是将史学的目光投向了当代,让脱贫攻坚这一人类减贫史上的壮举,有了贵州的文本记忆。

在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——史继忠学术文献展”开展当天的座谈会上,贵州省地质调查院的陈明华感慨:“老一辈学者学识渊博、文化功底深厚,由他们主持编纂的《贵州省志》等典籍,时至今日依旧是我们撰写文稿最重要的参考资料。”曾在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的钟莉则说:“史老师是贵州新方志编纂工作的开拓者和发起者。”

对于贵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书写,史继忠参与和尝试过的形

式几乎是全覆盖的。他编过《飘移的视线》《贵阳百年图鉴》《触摸夜魂》3本大型画册,策划《发现贵州》电视栏目,主编《贵州导游词》。在古稀之年所写的《自白》一文中,史继忠说,他姓史,学的是历史,一生以“史”为业,看来是“史”定了。

多元并存共生共荣,关于贵州文化的阐释

贵州文化的特征是什么?

1995年,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贵阳花溪召开“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”,第一次把贵州文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,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探讨。之后,史继忠作为《中华地域文化大系》贵州文化卷的主编,将其对贵州文化“多元文化”与“山地文化”的界定,写进该书中。

他认为,从总体上看,贵州地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,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和区域文化的子系统,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产生了许多复杂的文化现象。汉文化占主导地位,但它不是纯粹的汉文化,而是夹杂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。而少数民族文化也并非一种,而是演化出多种民族文化。

他把多元看作是贵州文化的基本特征——既指文化来源的多样性,也指多来源文化的共存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文化至今仍然共生共荣,各自以其传统为根基,又吸收其他文化向前发展,各种民族通过文化交融,逐渐实现多元一体。

但史继忠也强调:“这里所说的多元一体,是指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加强,共性增多,而不是融入某种强势文化。”“各种文化融而未合、合而不同是贵州文化最基本的特征。”这一贵州文化观,让贵州从边缘走向了多元共生的独特样本。他一直通过历史研究表明:贵州是一座被大山珍藏的、尚未被充分解读的文化宝库。

贵州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郑传春是史继忠著述的忠实读者之一,在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——史继忠学术文献展”开展座谈会上,她用“沉潜如深林,皎洁如明月”来形容史老师的书带给自己的感受。她说第一次读到史继忠关于贵州文化的解读时,她豁然开朗:“原来我们贵州的

文化可以用如此通达的方式来讲述。”她认为只有真正吃透学问的人,才能用最朴素的语言、讲出最生动的故事和最深刻的道理,“我感受史老师的书籍和文献更像是一扇扇门,只要轻轻推开,每一个人都能走进去,都能看见咱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万千气象。”

铁骨与柔肠,一个学人的情怀与趣味

在座谈会上,曾供职于《南方周末》的向郅说,史继忠是她“真资格”的老师。多年前,她因为一个报道选题求教于史老师,没想到因此开始了之后一年多时间里,史老师和她每周末一次的“约会”——在南明河边的翠微园,他们像旧时私塾的师生,史老师给她讲贵州历史、文化、掌故、逸闻趣事,既漫无边际,又干货满满。而她从史老师的讲述里,看到了历史、天地甚至个人成长的另外一番天地。

做严谨学术之外的史继忠,就是这样生动和性情。郑传春说史老师回忆经历的磨难时从不抱怨,经常在讲完之后又像孩子一样,笑嘻嘻地说自己喜欢在书房里养花花草草,还喜欢唱歌,近期又在兴致勃勃地思考“人类大智慧”的问题。她说“谦和如玉,坚韧如松,豁达如风”的史老师让她明白: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,内心一定有一片柔软丰饶的花园。

无论在怎样的年纪,无论对学术还是生活,史继忠都是一个充满“活人感”的鲜明的人。他的治学观点是“不能立说,不必著书”,认为凡写文章、著书都要有自己的见解,能“详人之所略,异人之所同,重人之所轻,忽人之所谨”,有自己的心得,说出自己想说的话。而一旦有自己的见解,他也绝不藏着掖着——读了美国学者亨廷顿的《文明的冲突》,他提出不同见解,认为“人类文明是相互传递的,冲突在所难免,但融合才是主流,多元才能让世界丰富多彩”,于是写出了《地中海——世界文化的漩涡》一书。

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这轮明月,更多来自史继忠那将近90岁也生机勃勃的心。在自己的学术文献展上,任众人争相发言滔滔不绝,史继忠只说了简短的几句话。他说:“我唯可告慰的是从1978年至今的半个世纪中,读书、探索、写作。”又说:“我的网名是‘老夫’,意在‘老夫聊发少年狂’,要与‘90后’中青年并肩同行。”



镇远赛龙舟,岁时端阳竞渡

周章辉

镇远地处湘黔两省交界之处,瀟阳河畔,水运发达,自古以来是水陆交通要冲,是西南大通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,素有“滇楚锁钥、黔东门户”之称,是一座历经2280多年历史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、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这里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完美结合,中原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在此接触、碰撞、交融,形成了镇远独特的地域文化,龙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。据史料记载,镇远早在战国时期就属于楚国的“黔中地”,深受楚文化影响。屈原投江后,楚地人为了纪念他,逐渐形成了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。至宋朝,赛龙舟活动已十分兴盛。宋朝官方下诏将五月初五定为“端午节”,谕令各地官府组织赛龙舟。镇远的赛龙舟活动也与这一传统密切相关,一直延续至今。

关于端午节赛龙舟的由来,在民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但时至今日,镇远人看重的还是承汨罗遗风、哀屈原之死与祈求“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”两方面。

镇远赛龙舟历史悠久,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,在不少的史志文献中均有记载。据明嘉靖《贵州通志·卷三·风俗》记载:“镇远府。岁时端阳竞渡。府临河水,舟楫便利。居人先期制造龙船,绘画首尾,集众搬演剧戏,以簪叶裹米为粽,弃水中,拽船争先得渡者,是岁作事俱利焉。”清乾隆《镇远府志·卷九·风俗》记载:“端午日,作龙舟戏,岁结彩,两岸观者如堵,以祈岁稔。”清朝徐家干的《苗疆闻见录》记载:“苗民好斗龙舟……其舟以大整木列成五六丈,前安龙头,后置凤尾,中能容20余人。短挠激水,行走如飞。”民国时期,镇远官方及民间仍组织举办声势浩大的龙舟大赛。镇远县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记载,为筹备民国三十二年(1943)端午节龙舟赛,由省立镇远民教馆馆长张家骞等召集各界人士进行筹备,于6月7日至9日举办镇远县各界划船竞赛大会。抗战时期仍有此赛事,可见其深厚的群众基础。又据《镇远县志》记载:“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,家家门前悬艾挂蒲,以艾叶、菖蒲、雄黄掺酒于室内外以除虫蚁,包粽子、煮鸡蛋,大蒜,饮雄黄酒,并以雄黄酒涂儿童脸、手,以避虫蛇,散去浊气。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,民间自筹资金,组织划龙舟,舟上装龙头、龙尾,抢鸭子活动,比赛活动时将活鸭子放入河中,由船手争抢。端午节这天,瀟阳河上,锣鼓喧天,龙舟翻波,人群熙攘。”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镇远赛龙舟传统体育文化复苏,中国镇远龙舟节正式命名,由此镇远每年都举办规模宏大的龙舟赛,吸引众多游客和龙舟爱好者前来观赏和参与,成为全县民众参与的体育运动和民族文化活动盛会。这个盛大庆典既保存了传统龙舟文化的种种古朴活动,又展现了新的精神风采。镇远赛龙舟保留了传统龙舟制作技艺和竞赛规则,还融入了道、佛、儒三教共融的传统祭龙仪式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,如陆上游行、群龙游江、开幕式、闭幕式、抢鸭子、放河灯等。镇远赛龙舟历经数百年传承,逐渐形成了规模宏大、赛戏同舟、亮点纷呈、全民狂欢等特征,享有黔中大地“龙舟之乡”和“龙舟文化发源地”等美誉。

在镇远,赛龙舟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竞技活动,更是融入了传统的民族文化活动,充分展现了镇远古老龙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无穷魅力。镇远的龙舟赛以地段来划分龙头标志,红龙、青龙、紫金龙、黄龙、白龙、菜花龙等龙船分别代表镇远城区不同街道的龙舟队。每条街都有自己特殊的龙船故事,每个龙舟队队员的服装与龙船、旗帜之间颜色要相匹配,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在赛龙舟期间,不仅有多支队伍参与赛龙舟,还有数万群众云集古城。赛龙舟活动通常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开始举行,历时3天。活动期间,整个县城都会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,热闹非凡。第一天主要是祭龙仪式、民间文艺游街和龙舟下水。各支龙舟队伍会举行隆重的祭龙仪式,各文艺队进行游行文艺表演,共同祈愿国泰民安。第二天正式比赛开始,各支队伍在瀟阳河上展开激烈角逐,吸引大量观众前来观看。第三天是决赛日,也是活动的高潮。经过两天前的预赛和半决赛,各支队伍在决赛中一决高下。比赛结束后,还会举行颁奖仪式和庆祝活动。

镇远的龙舟与常见的龙舟有所不同,具有独特的设计和制作工艺,龙舟都是用大整木精心雕刻而成,龙头龙尾栩栩如生,船身彩绘更是绚丽多彩。龙舟通常长达20多米,宽约1米,可容纳50至60人。龙头高大威猛,色彩鲜艳,龙身雕刻精美,整体造型极具气势。每支龙舟队伍由鼓手、锣手、桨手和艄公组成。鼓手是队伍的核心,负责指挥节奏;桨手则需要整齐划一地划桨,才能使龙舟快速前进;艄公则负责掌控龙舟的方向。赛龙舟活动既有本地的村民队伍,也有来自周边地区的专业队伍。数十条龙舟竞相争渡,敲锣打鼓,争先恐后,场面极为热闹。

镇远赛龙舟活动经过历史的沉淀,形成了独特的龙舟文化。它是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,不仅是一项传统的体育竞技活动,更是一项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,是多元文化共生共融和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会。2009年,镇远赛龙舟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镇远赛龙舟活动不断发展壮大,至今已举办了40多届赛龙舟文化节,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。镇远龙舟队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,镇远男子和女子龙舟队先后13次代表贵州省龙舟队在国家级和国际龙舟赛中获奖,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。



黔东南州镇远县龙舟队在瀟阳河上激烈比拼。宁坚 摄(影像贵州)

深林明月照来人

一场展览打开史学专家史继忠半世纪学术长卷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



史继忠部分手稿展示。贵州省图书馆供图